

为什么说鄂豫皖根据地是党的重要建党基地

□ 孙巍峰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等亲自指导了这里的建党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其建党实践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创造性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之一

1919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大别山及周边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创办刊物、成立社团等途径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探讨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大别山区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从城市到乡村最早、最广泛的地区之一。

五四运动后，在恽代英的倡议和组织下，利群书社于1920年2月1日在武昌正式成立，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大别山区旅汉青年接受新思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1年春，在恽代英的支持下，恢复了由林育南在1919年冬创办的黄冈八斗湾浚新学校的办学。浚新学校成为当时鄂东地区传播进步思想、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场所。1921年夏，恽代英、林育南等24名先进青年在浚新小学召开利群书社社员大会，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来后，恽代英宣布解散共存社，绝大多数成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骨干领导力量，在二七大罢工、安源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20年3月，董必武等在武汉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回到武汉，以武汉中学为基础，在湖北地区积极开展宣传马列主义和建立党组织的活动。武汉中学为大别山区培养了大批建党骨干和革命人才，是鄂豫皖革命的一个重要策源地。1927年大别山区爆发黄麻起义，起义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就有5名毕业于武汉中学。

在鄂东地区，1921年春，陈潭秋、胡亮寅、肖人鹄等，在黄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陈潭秋、陈荫林在黄冈陈策楼创办聚星学校，成为新思想宣传阵地和革命活动据点。在豫南地区，北京大学学生尚钺等人于1920年8月成立罗山青年学社，购进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刊物供学员研究。1920年冬，“互助社”和信阳柳林学校合作办学，许多学生纷纷加入“互助社”，并以此为桥梁与恽代英及湖北进步团体建立起联系。在皖西地区，1918年，陈独秀在霍邱讲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冲破旧思想的束缚，革新

教育和政治。在他的影响下，进步教师朱蕴山于1920年组建“中国革命小组”。1921年1月，高语罕编写《白话书信》，这是皖西地区最早最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课本。

最早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地区之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自鄂豫皖边区的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致函董必武，希望在武汉组织起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也高度关注武汉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他委派已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陈潭秋等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月，在董必武等人的寓所举行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会议。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最初建立的6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7名成员中有5人来自大别山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3名一大代表中，就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4人来自大别山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鄂豫皖边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鄂东北地区，1921年11月，陈潭秋在黄冈县的陈策楼和八斗湾成立了两个党小组，这是大别山区最早的基层党组织，次年春发展为两个党支部。1923年和1924年，黄陂、黄梅两县党的组织相继建立。1925年冬，黄安、麻城两县的中共特别支部分别成立。1926年，罗田和孝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1927年4月至5月，黄安、黄梅、罗田、麻城、浠水、蕲春等县先后成立中共县委。在豫南地区，1924年春，光山建立了柳林河党小组，7月始光县建立了党小组。1925年，在商城城关和商南笔架山职业学校建立了两个特支，不久，两特支合并成中共商城县委委员会。在皖西地区，1923年冬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1924年成立中共安庆特别支部。1925年，六安特别支部成立。1927年7月，霍山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到1930年9月，鄂豫皖边区支部达到281个，中心支部29个。

大别山区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的组织，树起了领导革命的红旗。党组织成立后，积极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特别是深入农村，广泛建立农民协会。1927年5月，鄂豫皖边区的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农民协会会员达10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9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的1/9以上。为了保卫农民运动成果，各地还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展开了大规模的农民自卫武装斗争，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

推动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

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健全，推动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1929年12月2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关于党的建设任务。

在思想建设上，边区党的组织极其“注意每个党员的政治学习”，创办许多带有地方党建设特色的党报、党刊，如鄂东特委创办的《英特纳雄耐尔》，皖西北特委创办的《党的建设初步》等。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政治讨论会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员逐步由单纯的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上来。

在组织建设上，大力加强县以上各级党委的建设，根据斗争实际，打破行政界线，减少层次，精简机关。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发展基层党员。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指示，考察入党对象必须注意五个条件：革命性强的，经济地位低的，与革命派无社会关系的，习惯好的，无恶劣嗜好的。各级党委举办专门训练班培训干部，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如鄂东特委成立的党务干部学校和鄂豫皖特委成立的郭家河列宁高级学校等。把建立和健全支部生活作为组织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

在作风建设上，根据地党组织在斗争中逐步养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在注重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根据地党组织还加强对根据地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注重群众团体的建设与发展，建立起工会、共青团、妇女会等比较完备的群众团体组织。

正定第一任县委书记尹玉峰

□ 李 芬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以一篇题为《知之深 爱之切》的文章，满怀深情地向读者介绍了自己“第二故乡——正定”的历史与文化。文中特别提到了正定第一任县委书记尹玉峰，并称他是正定第一批党的工作者“突出的代表”。

掀起反帝风暴

尹玉峰，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周通村（现石家庄高新区周通村）一户农民家庭，1922年秋考入正定直隶省立第七中学读书。1923年初，爱国开明人士、著名教育家王国光到七中担任校长。王国光秉承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迅速在七中营造了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的氛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尹玉峰阅读了《新青年》《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思想觉悟逐步提高。

1924年11月，冯玉祥部国民党第三军第三混成旅进驻正定，旅部就设在七中。该旅参谋长张兆丰、军需处长郝久亭都是共产党员，二人经常指导七中学生讨论时局、抨击时弊，并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12月底，二人将尹玉峰等5名进步学生发展为共产党员，并建立起正定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支部，尹玉峰任组织委员。

1925年2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七中党支部在正定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3月中下旬，支部以该会的名义在学校广场组织召开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各界代表300余人参加，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于方舟到会演讲。在此期间，经于方舟批准，七中支部改组为中共正定特别支部委员会，尹玉峰继续担任组

织委员。6月，正定共青团组织与正定特支合并，尹玉峰改任书记。在尹玉峰的领导下，玉华鞋庄工人郝清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定县第一个工人党支部成立。

不久，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正定后，正定特支响应党组织号召，成立了“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动员正定人民节衣缩食，捐款援助上海被害工人家属。6月7日，尹玉峰等领导组织了正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罪行的集会 and 示威游行，参加者达2000余人。紧接着，在6月25日“全国援助沪案总示威日”这一天，正定特支进一步组织发动了学生的总罢课及示威游行活动。这一连串的行动，促使反帝浪潮迅速席卷正定全城。

驱逐反动教育局局长

在尹玉峰的领导下，正定七中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并先后在正定直隶第八师范及吴兴、南高家营、韩通等高等学校建立了党的组织，从而使正定教育界的斗争有了主心骨。1926年1月，中共正定特支改组为中共正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尹玉峰担任书记。这年夏季，正定地委领导了驱逐反动教育局局长的斗争。

时任局长高肇绅，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不仅把正定教育界搞得乌烟瘴气，还经常打击迫害进步教师。正定的教师、群众曾自发组织起来到县政府，甚至到省城请愿、告发，但均无结果。6月，尹玉峰召开党组织会议，确定以吴兴、南高家营、韩通3个高小的党支部为核心，组建正定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开展驱

逐高肇绅的斗争。其间，高肇绅勾结反动县长彭懋修，想尽各种阴谋诡计，试图拉拢尹玉峰。然而，尹玉峰丝毫不为所动，坚定地领导联合会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斗争。恼羞成怒的高肇绅反而污蔑教师“污辱名誉，骚扰教育，触犯刑律”，并向县公署控告教师联合会。1927年3月审理此案，百余名教师到县公署旁听。在县公署二堂，联合会代表列举高肇绅十大罪状，最终迫使县公署以“不能统率全县教育工作”为由，撤销了高肇绅教育局局长职务，并给农村小学增加了经费，提高了教师的工资。

领导正定农民暴动

尹玉峰非常重视对农民的启蒙工作。从1926年初冬开始，在尹玉峰的努力下，正定县农村建起了平民夜校。他亲自到夜校讲课，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义务教员，在开展文化教育的同时，唤起农民觉醒。1927年6月，正定地委改组为中共正定县委，尹玉峰即成为正定党的历史上第一任县委书记。

当时，反动政府征收田赋税，春季征上半年的称“上忙”，秋季征下半年的称“下忙”，并且每亩地还要多征二块五角钱的“讨赤捐”。1927年5月，北伐军沿京汉铁路一路北上，驻守河北的奉系军阀准备逃窜。本来，他们在这年上半年已经预征了下半年的钱粮，然而，为了在逃窜前再“捞一把”，奉系军阀又提出预征1928年的“上忙”。此时，正定县刚刚遭遇了一场严重雹灾，夏粮受灾，秋收无望，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能缴“预征钱粮”和“讨赤捐”？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中共正定

县委决定领导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

尹玉峰亲自作了周密部署：借旧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正定赶城隍庙会的机会，要求各村党团员、农民协会会员和积极分子，利用一切关系，带领群众以赶庙会为由，到城隍庙集合。16日上午，正定城隍庙人流如织。10点多钟，在戏楼广场的人从中突然挑起了一面红色大旗，上面的“正定县农民反对讨赤捐大请愿”13个大字格外显眼。此旗一出，人们立即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尹玉峰站在高坡上，作了简短的动员之后，即带领群众高举大刀、长矛和铁铤，浩浩荡荡向县公署冲去。从小练过武术的郝清玉带头冲进了府衙大堂，举起三节鞭，一下砸碎了大堂的屏风，顿时吓坏了一班大小衙役。县知事金汪杉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出具废除“讨赤捐”“缓征钱粮”的公文，并盖上了正定县大方印。万余名群众高举县知事手谕，沿正定主要街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一直到下午3点钟才结束。这次农民暴动的胜利，不仅打击了奉军的气焰，也培养、锻炼了正定党的干部，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中，尹玉峰积劳成疾，不幸罹患肺病。1928年2月，尹玉峰回家边工作边治疗。3月间，病魔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临终前，他对亲人说：“我不行了，党还在。党现在虽小，但有生命力。我是看不到共产主义了，相信后人一定能看到。”尹玉峰的一生虽然短暂，然而，像他这样为中华民族，为家乡父老做过贡献、牺牲了生命的人们，都在正定县的爱国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创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的新纪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李 萍

在西北边陲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南侧，矗立着一座灰白色的纪念碑，庄严、挺拔、肃穆的造型展现出高耸入云的气势。纪念碑高32.6米，分为碑体、碑座、平台三部分，四面均用花岗岩砌成，基座周围装有汉白玉栏杆。碑体北面镌刻着王震的亲笔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座上的浮雕展现了解放新疆、屯垦戍边、各民族大团结的壮观画面。

纪念碑底座上分别用汉文、维吾尔文镌刻着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西北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胜利的阶段，兰州解放，接着一野一兵团解放了西宁，为解放新疆、解放全西北，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统一战略部署下，在解放军副总书记兼一野司令、政委彭德怀指挥下，在一野一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率领下，开始了进军新疆的行动。二军发扬长征精神，翻越祁连雪山，直插张掖，挺进酒泉；二、六两军准备入疆，新疆解放指日可待。陶峙岳、包尔汉分别于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通电起义。为巩固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一兵团加快了进疆的步伐。一九四九年十月，进疆大军西出玉门关，穿越星星峡，从空中到陆地，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至十二月初，一兵团领导机关和二、六两军主力先后抵达迪化、喀什、伊犁，与“三区”民族军和新疆起义部队会师，把五星红旗插到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结束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解放了新疆各族人民，开创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

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全体官兵为解放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新疆各族人民永志不忘！

为解放新疆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短短500余字的碑文，铭记了新疆和平解放、起义会师、巩固边防等重大事件，生动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光辉历史，缅怀了献身新疆无数先烈的丰功伟绩，展现了人民军队解放新疆的艰难历程及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1949年，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充分考虑新疆的历史及现状，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各路大军向华南、西南、西北迅猛挺进。在西北战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攻西安、克兰州、占西宁、取银川、进军河西走廊、兵临玉门，七万大军直叩新疆大门。为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委派邓力群为联络员会见“三区”（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革命领导人，传达中共中央的关怀和指示，并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力群通过迅速架设电台，沟通了“三区”与中共中央、一野之间的通信联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与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表示主张和平谈判，保证不做任何抵抗，和平接受解放，做好交接准备。“三区”革命汇入全国民主革命的洪流，壮大了新疆和平解放力量。为防止青海、甘肃溃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退至新疆带来后患，王震率第一兵团第二军由西宁北进，将士们以惊人的毅力，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战胜风雪严寒，沿途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兼程，挥戈西进，席卷河西走廊。在军事威慑和中共和平政策的感召下，陶峙岳、包尔汉于9月25、26日分别通

电，郑重宣布起义：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候听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通电一经发表，迪化（今乌鲁木齐）全城百姓欢声雷动，各族人民自发组织庆祝游行，欢呼新疆历史的伟大转折。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二）

新疆虽然宣布和平起义，但局势很不稳定。9月28日，一野前委发出进疆的部署命令，以第二军为左路军进军南疆，第六军为右路军进军北疆。两路大军，犹如滚滚洪流奔腾西进，向新疆展开气势磅礴的大进军。新疆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在当时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实施大规模进军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新疆气候多变，时已下雪，而部队的御寒装备紧缺，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的军衣，有的战士甚至连一双行军鞋都没有。在交通工具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战士们克服了气候恶劣、装备不足、物资匮乏等重重困难，完全依靠两条腿步行完成了上千公里的行军路程。部队官兵以顽强的意志，一路风餐露宿，翻越高山河流，穿过戈壁沙漠，最远行进3000多公里，先后平息了国民党部队多起武装叛乱，巩固了新疆和平解放成果，迅速完成控边边防任务，把五星红旗插遍了天山南北，解放了新疆，解放了大西北，顺利接管了千里边防，为推翻国民党统治、保卫国家安全、开创新疆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三区”通过调拨、募捐等方式，为解放军提供了粮



食、燃料及大量物资，派出兵团与骑兵团分别前往迪化、阿克苏，配合解放军进军南北疆。抽调少数民族进步人士组成随军工作团，协助解放军开展工作。12月7日，“三区”部队在迪化与解放军会师，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国民党起义部队则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12月17日，新疆军区、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新疆，是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重大胜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胜利。和平解放使新疆各族人民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阴谋，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了新疆千里边防历代有边无防的历史，保卫和巩固了祖国边防，开创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